

新发展格局下基于经济韧性的区域高质量发展问题 探析——以京津冀沪苏浙皖粤 8 省市为例¹

魏丽华

【摘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区域经济质量与经济韧性密切相关，经济韧性是区域在遭受外部突发事件时所展现出来的抵御风险冲击并不断进行调整、适应、恢复进而实现创新转型的能力，它是衡量区域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内三大区域 8 省市经济韧性的不同表现为例，结合新发展格局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围绕补短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构建完整产业链、畅通经济循环、实现经济高水平自立自强等目标，积极探索各省市提高经济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京津冀地区应聚焦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科创人文与现代金融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市场化程度的更高提升；长三角地区应聚焦改革创新、产业创新、链条创新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主题，以创新协同的核心驱动助力新旧动能转换；珠三角地区应立足于外向度高、经济活力强、创新能力等优势，聚焦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范围内的综合竞争力这一目标，以地理意义上的融合托举起产业、科技、金融与教育等多领域的融合。

【关键词】：经济韧性；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22)—06—0005(08)

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立足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主动调整与积极应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优化区域布局，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在衡量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中，经济韧性是重要构成之一。经济韧性是区域在受到外部突发事件冲击时所展现出来的抵御风险并不断进行调整、适应、恢复乃至实现创新转型的能力，它是衡量经济运行是否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基础，是区域发展可持续性的反映。

关于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分别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1]增强经济体制韧性和提高制度质量、^[2]构建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3]以及深化数字经济在培育新动能、新引擎和新业态中的重要作用^[4]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这些成果丰富了经济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体系，但也存在着不足。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在疫情冲击下，由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的不同，各地区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进而呈现的经济韧性也各有强弱。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该如何全面衡量疫情对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影响的差异化程度，各地区又该如何面对疫情常态化影响，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选择

¹作者：魏丽华，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 100081

基金项目：2021 年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机衔接研究”（21LLMLC042）。

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以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等 8 个省市为样本，通过对经济韧性机理的阐述，选择多个指标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系统评估上述地区在疫情中的经济韧性表现，并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探索补短板、育新机、增韧性以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二、经济韧性的计量方法与数据说明

韧性(Resilience)一词常见于物理学和生态学等领域，多用来表示材料对受力产生形变的抵抗能力，后来逐渐被引用至社会科学领域。Reggiani et al. (2002)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用到了这一概念。将经济韧性看作是经济体在遭受外部冲击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总和。^[5]这一能力反映出了经济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自我修复、自我更新并适应新环境的综合水平。

韧性概念的引入丰富了区域经济研究的范式，扩充了区域经济学中的研究手段并提高了其解释力，反映出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诉求。关于经济韧性的理解，Hassink(2010) & Edward(2012)主张从两个能力的视角来探索：一是经济系统抵御冲击扰动并维系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抵抗能力。反映出了经济系统在特定时点上有效分配现存资源的能力；二是经济系统通过迅速、多样化的响应措施来应对冲击的恢复能力。反映出了在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不断修复的过程与能力。^[6,7]这一解释从静态经济韧性与动态经济韧性的双重视角，既反映了经济体适应常规或预期压力水平的能力，又凸显了适应突发危机的能力。成为当前经济韧性领域的主流观点之一。^[8]

关于如何从危机冲击下的抵抗能力和应对危机中的恢复能力两个维度有效测度并评估区域经济韧性，Martin(2012)提出了两个简单的指标：采用危机冲击期地区的就业情况变化来衡量恢复力；采用该地区在冲击期的就业人数变化与国家层面就业人数变化的比例来表示抵抗力。^[9]用表达式来描述即为：

$$\beta = (\Delta E_r / E_r) / (\Delta E_n / E_n) \quad (1)$$

其中，E 代表地区的就业水平， $\Delta E/E$ 是就业水平变化的百分比。r 为地区尺度，n 为全国尺度。如果 β 小于 1，表明该区域经济对危机冲击的抵抗力较低。反之，则表明抵抗力较高。

当前，国内学者在普遍参照 Martin(2012)这一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发展现实，大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就业率变化的敏感系数来描述区域经济韧性。如：曾冰(2018)基于 GDP 的变化情况测度了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省域经济的韧性程度。^[10,11]林耿等(2020)基于地方生产总值的变化测算了佛山市 2008 年和 2013 年 30 个专业化镇的经济韧性。^[12]

本文借鉴 Martin 等(2012)的研究方法，从抵抗力与恢复力两个角度来评价疫情冲击下我国相关区域经济韧性的表现。但有所不同的是：

(1) 指标选择：

为全面反映各区域经济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本文从 4 个方面来测算经济韧性：选择 GDP 代表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额代表开放度、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发展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居民福祉。另外，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公报。

(2) 时间选择：

对突发事件影响下区域经济的韧性测度通常需要考虑危机发生期、前期和后期 3 个时期的情况。结合疫情集中爆发的时间节点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 2020 年作为疫情发生的基期(t 期)，选择 2019 年数值作为(t-1)期进行抵抗力的分析，选择 2021

年的数值作为(t+1)期进行恢复力的分析。

(3)地区选择:

为了全面测算疫情下国内各地区的经济韧性,本文选取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代表京津冀地区。按照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确定的长三角城市群的涵盖范围,^②选择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4省市代表长三角地区。选择广东省代表珠三角地区。以此为根据,按照上述方法分别计算8个省市的经济韧性。

综合上述说明,本文测度经济韧性的抵抗力(dk1)与恢复力(hf1)指标将按照以下公式进行:

$$\beta_{dk1} = (E_{r,t}/E_{r,t-1}) / (E_{n,t}/E_{n,t-1}) \tag{2}$$

$$\beta_{hf1} = (E_{r,t+1} - E_{r,t}) / E_{r,t} \tag{3}$$

其中,Et 是2020年相关指标,即危机冲击期;Et-1为2019年指标值,即危机前期;Et+1为2021年指标值,即危机后期。Er代表地区尺度指标,En代表全国尺度指标。此外,在采用前述公式的基础上为了得出更全面的结论,论文采用赋值法,即在计算出相关省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基础上按照指标值高低进行赋分。因为选择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所以指标值最高的地区赋1分,第二名赋2分……以此类推,最后进行加总,总分越低的表示抵抗力(恢复力)越强。

表 18 省市生产韧性指标表

指标	生产抵抗力		生产恢复力		综合得分
	数值	得分	数值	得分	
北京市	0.5217	8	1.0494	2	10
天津市	0.6522	7	0.8148	7	14
河北省	1.6957	1	0.8025	8	9
上海市	0.7391	6	1.0000	5	11
江苏省	1.6087	2	1.0617	1	3
浙江省	1.5652	4	1.0494	2	6
安徽省	1.6087	2	1.0247	4	6
广东省	1.0000	5	0.9877	6	11

三、八省市的生产韧性分析

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8省市的生产韧性值,见表1。

² ①其涵盖的范围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和安徽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26市。

1. 疫情下生产的抵抗力与恢复力

表 1 显示，经济总量受疫情冲击最明显的是北京、天津和上海，最弱的是河北、江苏和安徽。面对疫情冲击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社会生产恢复最好的前三名是江苏、浙江和北京，而恢复力偏低的三个地区为河北、天津和广东。

2.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分析

综合 8 省市生产抵抗力与恢复力表现，按照赋分法可以发现，生产韧性表现最好的是江苏省，其抵抗力排第二，恢复力排第一。而生产韧性最低的是天津市。对这一现象本文从产业结构的视角进行解释。

(1) 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第三产业占比较高，韧性偏低

众所周知，京津沪三市三次产业结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三二一”结构性特征。三市 2020~2021 年第三产业占比分别在 80%、70%和 60%以上。而疫情的爆发由于对人员聚集、流动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对第三产业的冲击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产业增加值指数变动中三市第三产业降幅明显大幅高于第一、二产业，尤其是上海市和北京市，降幅分别位列第二、三位(仅次于河北省)，高于全国水平。从而导致第三产业占比明显偏高的三直辖市在疫情冲击下国民经济总量收缩更为明显。除了第三产业降幅明显以外，北京和天津的第一、二产业也呈下降走势，进一步恶化了生产韧性。尤其是天津市，生产抵抗力和恢复力均为 7 分，直接导致了韧性水平最低。除了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外，也和其新动能培育迟缓、转型升级压力大、经济活力不足等密切相关。唯一可圈可点的是北京的生产恢复力，虽然其生产抵抗力最低，但是恢复力中位列第二，展示出了良好的复苏弹性。这很大程度上与其能在短时间内较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围绕新基建、新场景、新消费、新开放、新服务等领域，聚焦数字经济与高精尖等新经济业态所爆发出来的恢复能量密切相关。

广东的生产抵抗力 5 分、恢复力 6 分。综合表现仅高于天津，与上海持平，居后三弱之列。从产业结构来看，其第三产业占比同全国水平相等，虽然低于三直辖市，但高于其他四省。正是因为其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高，在疫情冲击下拉低了抵抗力。此外，就 2020 年产业增加值指数环比变化来看，除了第一产业指数同 2019 年持平以外，第二、三产业均是负增长。同时，2021 年 8%的 GDP 增速也低于全国水平，仅高于河北和天津，这直接导致了其经济韧性水平的偏低。

(2) 江苏、浙江和安徽：产业结构更为均衡，韧性偏高

作为 8 省市中生产韧性的前三强，江苏、浙江和安徽三个省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第二、三产业结构的相对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三省 2020 年第二产业占比均在 40%以上。以此为支撑，尽管受疫情冲击，三省 2020 年第二、三产业的走势均大体好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了良好的生产抵抗力。同时，三省疫情期间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的推动以数字经济为引擎的新动能快速成长，强化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加快工业产能复苏，促进服务业稳步恢复，展示出了良好的生产恢复力。

(3) 河北：抵抗力与恢复力两级分化

河北省的生产抵抗力位列 8 省市第一，但恢复力却居第八。如此截然相反的表现也与其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就抵抗力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略高于安徽省，是 8 省市中的第二低。疫情期间，其第一、二产业指数不降反增，分别与江苏和上海构成“唯二”的指数正增长省份，进而成为疫情下生产抵抗力最高的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河北省第一、二产业的坚挺能力。但是其 2021 年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6.5%的生产增速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 8 省市中的最低值。这与疫情恢复期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转型升级任务艰巨、营商环境亟待改善等现状密切相关。

表 2 8 省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韧性表

指标	抵抗力指标		恢复力指标		综合得分
	数值	得分	数值	得分	
北京市	0.5269	8	0.8791	7	15
天津市	0.7276	7	0.9008	6	13
河北省	1.2195	2	0.9099	5	7
上海市	0.8548	6	0.8791	7	13
江苏省	1.0227	5	1.0404	4	9
浙江省	1.0651	4	1.0788	2	6
安徽省	1.3596	1	1.0953	1	2
广东省	1.0989	3	1.0617	3	6

四、八省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韧性

1.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抵抗力与恢复力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居民财富、富裕程度以及获得感的风向标。它与居民消费能力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从表 2 可以看出，疫情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抵抗力最强的三地为安徽、河北、广东，最弱的三地则为北京、天津和上海。恢复力最强的前三名是安徽、浙江和广东，而最差的后三位依然为北京、上海和天津。

2. 比较分析

综上分析可看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韧性最强的是安徽省，最弱的则是北京市。之所以呈现出如此走势，则和各省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及构成密切相关。

(1) 三个直辖市：收入水平高，韧性低

从绝对值来看，三个直辖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三个直辖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列 8 省市的第 2、4、1 位（第 3 位是浙江）。呈现出了疫情下高收入水平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韧性弱于低收入水平地区的特征。探究其收入水平背后的结构可以发现，在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的共性特征下，三市的经营净收入占比为 8 省市中的后 3 位，大幅低于全国水平；而转移净收入占比则居前 3 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北京和上海的财产净收入位居前两位。转移性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正相关。承接前面分析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三市的弱 GDP 韧性直接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韧性的同样弱化。从表 1、2 的分值情况也可看出，三市的 GDP 抵抗力分值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抵抗力分值相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韧性排序同 GDP 韧性排序一致。

(2) 安徽：收入水平低，韧性最高

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安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其指标值位列 8 省市第 7 位。由于其收入水平较低，疫情带给其收入变动的弹性值也相对较低；同时再结合前述其 GDP 韧性位居 8 省市第 2 高的特征，推动了其收入韧性在 8 省市中的遥遥领先。同时，其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均是 8 省市中的最低值，而经营净收入占比则是最高值，也是 8 省市中高于全国水平的唯一值。这既显示出了其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优良的创业氛围和营商环境，也解释了其收入韧性高的根源所在。

(3)浙江：高收入水平地区的亮丽风景线

浙江位列高收入水平方阵，其收入绝对值位列 8 省市第 3 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但不同于三直辖市的是其收入韧性良好：其韧性值居第 2 位，仅次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安徽，成为高收入水平地区收入韧性表现优异的一道亮丽风景。究其原因，也可以从收入结构中得到启示。除了工资性收入以外，其占比最高的是经营性收入。该收入占比居第二位，仅低于安徽省，显示出了市场活力的持续回升以及社会生产的积极稳步恢复。正是这一结构性差异，再加上其收入基数的庞大，从而提升了浙江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韧性。

(4)广东：相对较低收入水平地区韧性较高的代表

在 8 省市中，广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偏低，其收入值位列 8 省市的第 6 位，仅高于河北省和安徽省。作为低收入水平地区呈现出抵抗力和恢复力均衡，韧性较高的特征。就收入结构来看，其工资性收入占比在 8 省市中最高，显示出了其就业形势的稳定向好。此外，财产净收入占比也高，仅次于北京和天津，居 8 省市第 3 位，显示出了居民储蓄理财以及房屋等财产获益的能力；占比最低的是转移净收入，是 8 省市中的最低值。这一特征既是其经济运行稳定、产业发达、就业机会多、房地产价格高的深刻反映，也解释了其居民可支配收入韧性良好的原因。

表 3 8 省市的对外开放韧性分析

指标	抵抗力指标		恢复力指标		综合得分
	数值	得分	数值	得分	
北京市	-10.0526	8	1.4299	1	9
天津市	-0.0526	6	0.7617	8	14
河北省	5.3684	2	1.0047	4	5
上海市	1.2105	5	0.7710	7	12
江苏省	1.3684	4	0.7991	5	9
浙江省	5.0526	3	1.0467	3	6
安徽省	7.1579	1	1.2570	2	3
广东省	-0.4737	7	0.7804	6	13

五、八省市的对外开放韧性分析

1. 对外开放的抵抗力与恢复力

表 3 显示, 疫情冲击下对外开放抵抗力最高的前 3 名是安徽、河北和浙江; 最低的则为北京、广东和天津, 其指标值均为负值, 显示出了疫情对三地对外开放的严重冲击。疫情发生后各地都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复工复产。其中恢复力最好的前 3 名是北京、安徽和浙江。而恢复力偏弱的地区则为天津、上海和广东。

2. 对比分析

综合 8 省市对外开放抵抗力和恢复力的整体表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安徽、河北和浙江: 韧性水平最高

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可知, 安徽和河北的经济外向度偏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两省 2020~2021 年的进出口指标值在 8 省市中最低。两省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 14.09% 和 12.31%, 不仅低于其他 6 省市, 也大大低于当期全国 32.02% 的平均水平。正是由于经济外向度低, 在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带来深刻影响的情况下两省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相对较弱, 呈现出了较好韧性。

与二者不同的是, 浙江省进出口规模大, 经济外向度高。2021 年其外贸依存度为 52.39%, 进出口指标值位列 8 省市第 4 位。虽然受疫情影响, 但是其货物进出口依然保持了快速增长, 2021 年进出口规模首次居全国第 3。^[13,14] 在高外贸依存度中展示出坚挺的对外开放韧性, 本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良好的外贸结构。浙江的进出口结构中近 80% 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相比, 疫情对一般贸易的冲击相对较弱。2020~2021 年浙江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分别增长 14.8% 和 8.8%、28.8% 和 19.3%。这一结构造就了浙江省对外开放抵抗力与恢复力居 8 省市第 3 的不俗表现, 展示出了外贸大省的良好韧性。

(2) 天津、广东和上海: 韧性水平最低

天津的对外开放抵抗力赋 6 分, 恢复力赋 8 分, 韧性最弱。首先, 其外贸规模不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2020~2021 年其外贸进出口总量在 8 省市中位列第 6, 仅高于河北和安徽。其次, 贸易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 中小企业比例达 90%。^[15] 贸易结构主要集中于传统加工制造业、化工、机电和电气设备、钢材、纺织服装等产业。这些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原材料和半成品为主, 科技含量偏低。在疫情对人员聚集和交通运输提出更严格约束的情况下, 再叠加国家环保等压力, 其韧性的弱化也就得到了一定解释。

广东外向度高, 外贸量受疫情冲击明显。对外贸易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2021 年其进出口总量在 8 省市中最高, 外贸依存度达 64% 和 66%。正是由于外贸量庞大和外贸依存度高, 其对外开放受疫情影响也更为深刻。而且, 就贸易方式来看, 其加工贸易占比较高, 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2020、2021 年其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26%、30%, 贸易额增幅分别为: -13.0% 和 -13.5%、14.1% 和 12.7%, 均弱于一般贸易。同时, 再结合前述广东 GDP 中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特征可以认为, 外贸量大、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外贸依存度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 是对疫情下广东省对外开放韧性低的深刻诠释。

上海对外开放韧性值为 8 省市的第 3 低。本文对此的解释为: 首先, 外贸依存度高。根据上海统计年鉴, 其 2020、2021 年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 90% 和 94%。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无疑成为对外开放风险的源头。其次,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口岸, 疫情期间全球外贸、金融、经济动荡等一系列风险, 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中股市的几次熔断对上海的股市、债市、期货市场冲击明显。再次, 上海总部经济特征明显, 比较优势下的分工体系造就了产业链中诸多环节并不在上海, 疫情对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冲击同样也传递到上海的外贸领域, 叠加全球制造业的不景气, 共同造成了上海对外开放的

低韧性。

(3) 北京：抵抗力与恢复力表现差距最为悬殊

疫情下北京的对外开放抵抗力最弱，但恢复力最强。对此本文认为：抵抗力弱主要源于偏高的外贸依存度和以国企、一般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2020 年北京外贸依存度为 65%，在 8 省市中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高。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占 86%。其中，国有企业占 66%。疫情冲击下，2020 年北京一般贸易进出口下降 18%。其中，国有企业下降 27%，加工贸易虽然只占北京货物进出口总额的 4%，但是 39% 的降幅格外明显。而占加工贸易总额 75% 的国企降幅更是高达 45%。^[16]此贸易结构深刻诠释了北京对外开放抵抗力明显弱化的根源。关于恢复力，疫情下北京迅速推动贸易结构调整。根据北京海关数据，2021 年北京农产品、原油、天然气、煤及褐煤、金属矿及矿砂等进口额增长 39.2%，占进口总值的 62%，成为北京对外贸易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主要出口商品中成品油、医药材及药品、手机的出口分别增长 2.7%、14.3 倍和 29.8%。同时，民营企业在外贸领域的灵活性也得到激发，2021 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增长 29%，近 5 年内增速首次高于全国水平。^[17]这些举措造就了北京外贸韧性的修复。

表 4 8 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韧性表

指标	抵抗力指标		恢复力指标		综合得分
	数值	得分	数值	得分	
北京市	0.8148	7	1.0000	6	13
天津市	1.0345	6	0.9796	7	13
河北省	1.1034	5	0.6122	8	13
上海市	3.8148	1	1.6327	3	4
江苏省	0.1111	8	1.1837	5	13
浙江省	2.0000	3	2.2041	1	4
安徽省	1.8889	4	1.9184	2	6
广东省	2.6667	2	1.2857	4	6

六、八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韧性分析

1. 固定资产投资的抵抗力与恢复力

表 4 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抵抗力最好的三个地区是上海、广东和浙江，最弱的三地是江苏、北京和天津。恢复力表现最好的三地是浙江、安徽和上海，最弱的则是河北、天津和北京。

2. 对比分析

(1) 上海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韧性最好

两地固定资产投资韧性良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资金质量及来源的非国有性。根据两地统计局数据，上海 2020、2021

年外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 38.5%和 41.3%,远高于内资投资增速。其中,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达 13.1%,远高于 3.7%的国有经济投资增速;浙江 2020、2021 年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为 2.6%、8.9%,均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近 60%。正是这一强劲的结构特征塑造了两地固定资产投资韧性的良好态势。

(2)河北、天津、北京和江苏:固定资产投资韧性偏低

四省市冲击力和恢复力值均超过 4,韧性值相等,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领域韧性欠佳。对此仍可从投资结构的视角得到解析。

江苏省 2020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68.8%,当年其民间投资下降 0.8%,国有及国有经济控股投资下降 1.7%。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民间投资权重过高,所以其投资下降拉低了全省的投资水平表现。

河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更多依靠民间资本。2020、2021 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均在 66%以上,而这两年其投资增速分别为-5.1%和 2.0%。此外,从产业结构投资来看,河北省占比较高的第二产业在 2020、2021 年的投资增速分别为-5.6%和 0.6%。因此,也可看出民间资本、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造成了其韧性的弱化。

京津二市按产业结构投资来看,根据 2020~2021 年统计数据计算出其三次产业投资均值分别为:-41.15%、33.10%、2.0%和-18.60%、4.70%、3.75%。结合其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以及疫情对第三产业冲击更为明显的特点可以认为,第三产业投资增速的放缓和第一产业投资的负增长拉低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形成了固定资产投资韧性较弱的局面。

七、结论与对策

综上分析发现,总体上三直辖市的经济韧性弱于其他五省。对此解释为:受结构性与规模性等因素影响,五省大多产业结构完备,产业关联度强,经济体量庞大,经济内循环能力相对较强,在危机冲击面前展示出了良好的韧性。而三直辖市目前均处于后工业化时期,^[18]第三产业占比与经济外向度明显偏高。因此,本文认为,更多地依赖以消费、服务、外贸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疫情等突发事件影响下更易出现大幅波动,经济韧性受到更多挑战。保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稳定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适当比重,防止产业空心化,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固地方经济发展,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京津冀地区

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市场化程度的更高提升;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积极培育发展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聚焦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科创人文与现代金融等领域,构筑安全、完整、优质的产业链,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更高层次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稳增长、调结构,平衡南北分化,探索出一条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其中,北京应完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型经济,加快推广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and 居民收入结构,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发展成果。天津应以优化发展环境、壮大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既有产业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活市场要素内生动力,在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居民福祉的同时,构建潜力大、内力足、外向度合理的发展格局。河北应加快推进去产能、调结构、转方式,做大经济总量,建设具有河北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以内涵式增长驱动河北的发展更有质量、民生的福祉更有温度。

2. 长三角地区

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应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主题，立足于创新协同的核心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聚焦于改革创新、产业创新、链条创新等关键领域，协调好发展速度、改革力度、示范强度的关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新样本。

其中，上海应以“四大功能”的全面强化为引领，夯实经济基础，加大民生福祉改善，加快培育新动能，完善对外开放体系，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更好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江苏应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为主导，以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为目标，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水平，增强抵抗突发事件的能力。浙江应聚焦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取得新突破；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以更加符合低碳发展要求等。安徽应以科技和产业为突破口，以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强与结构优为方向，以打造制造强省、质量强省、网络强省、数字江淮为目标，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统筹中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同步提高。

3. 珠三角地区

对于代表珠三角地区的广东来说，新发展格局下应立足于外向度高、经济活力强、创新能力优等发展成果，充分放大“双区”建设所赋予的强大动力和独特优势，聚焦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范围内的综合竞争力这一主旨，以地理意义上的融合托举起产业、科技、金融与教育等多重优势的融合，在确保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稳定、独立自强的基础上实现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提升。力争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区域协同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 [1] 耿蕊. 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三地面板数据的分析[J]. 2019, (11):142-145.
- [2] 李恩付. 建设有活力有韧性资本市场助推经济内生性高质量发展[J]. 财富时代, 2020, (02):28-29.
- [3] 张振, 赵儒煜. 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探讨[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 (03):47-52.
- [4] 荆文君, 孙宝文.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经济学家, 2019, (02):66-73.
- [5] Reggiani A, Graff T, Nijkamp P. Resilienc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patial Economic Systems[J]. 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 2002, 2(02):211-229.
- [6] Hassink R. Regional Resilience: A Promising Concept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Adaptability[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3(01):45-58.
- [7] Edward H. Economic Shock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J].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y and Its Effects, 2012, 4(04):23-35.
- [8] 侯俊东, 肖人彬, 吕军. 地质灾害系统的经济弹性及其结构研究[J]. 灾害学, 2013, (03):11-15.

-
- [9] Martin 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12(01):1-32.
- [10] 曾冰.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省域经济韧性发展评价[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07):16-22.
- [11] 曾冰.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J]. 金融理论与教学, 2018, (04):84-88.
- [12] 林耿, 徐昕, 杨帆. 佛山市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经济韧性的关系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09):1493-1504.
- [13] 2020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tjj.zj.gov.cn/art/2021/2/28/art_1229129205_4524495.html.
- [14] 2021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tjj.zj.gov.cn/art/2022/2/24/art_1229129205_4883213.html.
- [15] 许彦斌. 后疫情时代天津中小外贸企业发展[J]. 对策经营管理, 2021, (22):88-90.
- [16] 国家统计局. 2021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118.
- [17] 北京海关. 2021 年全年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跨越 3 万亿元大关[EB/OL]. http://nanjing.customs.gov.cn/beijing_customs/434756/434804/2941702/434773/434775/4140636/index.html.
- [18] 谭洪波, 夏杰长. 协调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N]. 光明日报, 2020-12-12(05).